



# 20世纪西方修辞美学关键词

---

谭善明 杨向荣 等著

齊魯書社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西方修辞观念研究”(08CZW004)前期成果

# 20世纪西方修辞美学关键词

谭善明 杨向荣 等著

齊魯書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 世纪西方修辞美学关键词 / 谭善明等著. — 济南:  
齐鲁书社, 2012. 10

ISBN 978 - 7 - 5333 - 2681 - 4

I. ①2… II. ①谭… III. ①修辞学—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H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36695 号

## 20 世纪西方修辞美学关键词

谭善明 杨向荣 等著

---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qlss.com.cn](http://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ilupress@126.com](mailto:qilupress@126.com)

印 刷 日照日报印务中心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3

插 页 2

字 数 310 千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33 - 2681 - 4

定 价 40.00 元

---



## 前 言

### 一

修辞学有着古老的历史。从广义上说，自从人类语言产生时起，修辞活动就开始了，这主要是指在特定情况下对语言运用方法或效果的关注。修辞学理论初步形成的时间在中国和西方基本是相同的：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出现了以传授修辞学为业的“智者学派”，而此时的中国处于春秋战国时期，“处士横议，百家争鸣”，修辞理论逐渐从言语实践中产生。从修辞理论诞生之日起，修辞学就同语言和实践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它是以形象的语言来说服对方或实现特定的目的。所以修辞性的语言不同于普通表达的语言，它们虽然同样服务于人类实践，但修辞因其审美特性而增强了表达的效果。特别是当修辞学转入书面语以后，它所特有的“美的表达”更加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然而，一种对修辞很狭隘的见解今天还广为存在着，那就是将修辞看做是咬文嚼字、雕琢词句的技巧，这意味着修辞学难登大雅之堂。这不仅是修辞学在中国的不幸遭遇，从中世纪以后，西方修辞学也经历了一段艰难的岁月，它作为语言上的美化和装饰，作为一种在偏离中产生审美愉悦的技巧，受到理

性主义的不断讨伐。实际上，这种语词技巧上的修饰只是修辞活动很小的一部分，修辞的活力表现在它对话语的建构过程中，这种活力正是修辞学从它的古希腊罗马传统一直继承下来，并在今天西方得以发扬光大的东西。不过由于修辞本身所无法割舍的目的性，使修辞的审美研究难以独立。西方古典修辞学是与政治学和伦理学密不可分的，当代修辞理论更多从语言、社会实践、哲学三个层面展开，审美研究往往穿插其中。这三种研究的特点分别是：

第一，语言层面的静态研究。这种研究主要关注修辞技巧，分析总结语言运用过程中能提高表达效果的修辞手段。从宏观的角度，总结语音、词汇、语法、文体等各个方面的语言现象，从中发现语言使用的特殊表达规律，使各种语言手段具有的修辞特性系统化，这样就产生了一个与语言的普通用法即“零度修辞”系统相对应的修辞系统。另一方面，是进行具体的话语分析或文本分析，将语言的使用与特定的语境联系起来，在具体的语言活动中考察修辞特性和修辞效果。但这仍是一种静态研究，重在探索与语境相适应的修辞技巧和修辞手段。人们总结规律不仅是为了揭示修辞的普遍性，更是为了对语言使用进行指导。无论是宏观的总结还是具体的分析，都往往试图一劳永逸地把握住语言的变化。这种修辞研究具有一种符合论的倾向，存在这样一个预设，那就是妥帖的修辞表达能够将所指准确而完美地呈现出来。因而，“合适”、“得体”被奉为修辞的最高原则，整个修辞过程被看做是语辞的调整或适用，修辞方法的本质也就成了对表达要求的适应和对表达效果的提高。

第二，社会实践层面的动态研究。这种研究主要关注修辞策略，虽然也强调语言使用的技巧，但不同的是，修辞在此被



看做一种行为而不是一种状态。它以演说或社会交往中的修辞活动为研究对象，关注话语修辞如何在社会事务中发挥效用，考察话语与人的思想、情感、动机和行为的关系。这种研究不以普遍性和规律性为目标，而是分析在某一特殊情境中话语与现实的动态关系。社会实践层面的修辞研究将修辞的目的性提高到首要位置，更加追求话语表达的效果，认为修辞自身的重要性体现在其话语行为中，自身之外的东西制约着修辞表达。

第三，哲学层面的研究，这种研究关注的主要是认知问题，即修辞如何参与了语言、思维、知识以及意识的建构。它考虑一般性问题，因而不同于动态研究；但它不研究抽象的知识以及意识的认识论，而是在特定语境下话语行为中所体现出来的认识论，因而又不同于静态研究。虽然语言和劝说构成了这种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它主要揭示话语的运作机制，强调某种牢固的认识论对修辞性言说的制约。修辞哲学实际上是对传统哲学的反叛，它研究的是人类话语活动中的或然性真理，并进而认为真理都是在语言中生成的，而不是被发现的，是修辞而不是真理确立了我们言说及行动的方向。

语言学的研究追求语词运用的理想化效果，反对文而无质的纯粹修辞技巧，强调美与真的统一，无论是规律总结还是具体分析，都对修辞的美学价值有了一定的考虑；但情况经常是，用具有美感的修辞现象验证修辞规律，或者相反，从普遍的修辞特性阐释具有审美意义的修辞个案。在这两个过程中，美学原则都是次要的，它只是作为修辞的结果而出现。这种研究在国外主要与语言训练和写作的教授一起出现，国内大部分修辞学著作都集中在语言学研究上，更注重的是修辞现象的分析和总结。社会实践层面的研究则强调美学原则的可利用性，将语词的选择、润饰直接与修辞效果相挂钩。修辞在此被视为说服

的艺术，更关注的是这门艺术如何实现语言与行为的辩证法，而不是如何使感官产生愉悦的问题。这种研究试图恢复亚里士多德《修辞学》所勾勒的框架，尤其注重对演说、辩论的研究，又常常涉及心理学、社会学的内容，这在美国当代修辞学中比较多见，比如对海湾战争期间布什和萨达姆电视讲话的修辞分析就属此类。对审美而言，哲学层面的研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发现人每一次对世界的重新认识都含有美学冲动，修辞对或然性真理的构建经常是在审美中完成，并且由审美保存下来。这是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待修辞，修辞不仅很大程度上参与了人类的语言活动和实践活动，而且更进一步地参与了人类知识、观念、思维的构建，从而渗透到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

英美“新批评”和布斯的《小说修辞学》为修辞的美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新批评”对文学中的反讽、隐喻、象征、含混的分析，揭示了修辞在文本内部是如何确立独特的文学性的。但由于“新批评”的文本中心倾向以及对技巧的过分重视，使得他们的文本分析更接近纯粹的文学研究而不是修辞研究。修辞学始终是两个方面的结合，即话语运作和说服力，它与文学或诗学的区别也正在于此。布赖恩特指出：“真正的诗学其目的是创造及组织想象性的感受，从而可能为读者或观众提供某种令人满足的精神及情感上的治疗。修辞追求的是一种事先确定的对观众的认识或态度的引导。诗歌通过表现来起作用，而修辞则用鼓动来达到目的。诗歌是在创造中实现的，而修辞是在启迪中成功的。”<sup>①</sup> 这虽然仍旧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区别，并且在书面语中有所变化，但这种区别规定着修辞所无法摆脱

---

<sup>①</sup> 布赖恩特：《修辞学：功能与范围》，顾宝桐译，见《当代西方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4页。



的特定目的性，这为其审美特性的展现赋予了特别之处。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修辞学长期以来深深地影响着文学及文学理论，作家与读者都受过修辞方面的训练，这一事实似乎意味着修辞学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文学研究，它为文学提供基础性的服务，这就是将修辞技巧当成修辞本身所导致的后果。所以要保持修辞学的独特性，那就要将修辞看成是感动人、影响人的艺术，要更加重视修辞的功能和效果，而不是单纯地陷于形式技巧中，就要将修辞看成是在美的形式中发挥效用。

从这种意义上说，布斯的《小说修辞学》是真正从审美角度进行的修辞研究。他将作者、叙述者、人物和读者之间的关系看成一种修辞关系，作者通过各种修辞技巧和手段，在文本中建立起各种角色的联系，由此达到特定的审美效果。在小说中，作者的声音及其价值判断、道德干涉是不可避免的，作者考虑的不是是否使用修辞，而是使用何种修辞来实现自己的意图。这并不意味着一种文学研究只要突出作者的“控制”，就会成为修辞研究，在文学活动中，读者绝不是完全被动的，他也经常会影响甚至决定作者的修辞表达。另外，布斯所考察的是小说中修辞的艺术效果如何体现出来，如果认为小说中有说服的成分，那么它也只是人类话语活动的一部分，对修辞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所关心的正是，修辞是如何在包括文学在内的话语活动中进行审美建构的。但是，修辞的审美之维，应当归因于作者独具匠心的经营吗？在一个放逐主体的时代，如何能够谈论作者的修辞？第二个问题是，修辞学如果不是服务于文学的，它就不应当停留于维护语言使用的纯正性、正确性。



## 二

修辞学和话语是不可分割的，从古希腊至今，修辞学一直无法摆脱言语行为中的目的性，“它不把话语和作品仅仅视为进行美学沉思或无限解构的文本对象，却将它们视为与作者和读者、演说者和听众之间的广泛社会关系密不可分的活动形态，脱离其植根的社会目的和状况，就多半不可理解”<sup>①</sup>。从这种意义上说，修辞学可以看做是一种话语理论，它将美学形式与话语的实践价值紧密结合，为了突出这种关系，我们采用“话语修辞”这一表述，以强调修辞学的话语特性。修辞在语言运作过程中非常注重语言使用的效果，其固有的审美追求是和特定的目的性联系在一起的，它在用语言之美给人以愉悦的同时，还试图打动人、影响人。

作为技巧层面的修辞活动发生在语言的正常表达中，更多地只是涉及语言形式层面的使用，它首先是追求语言本身的完美通畅，以便有效地传达意义。诚然，修辞的一个基本功能是保障语词使用的规范、语言表达的通顺以及篇章布局的合理，它可以有效地避免语言搭配上的、结构上的、逻辑上的失误，以实现语言表达的正确性和准确性。另外，文学在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文体和流派，为具体的修辞活动提供了美学规范，形成了比较明显的语言风格和表现手段，由此产生的修辞形式也并不是直接与目的性相关。这样的修辞形式当然还包括个人特定的语言风格，不同时期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语言使用习惯，在词语、句式的选择和搭配上都会带有个人色彩。凡此种种，

---

<sup>①</sup> 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25页。



都属于语言本身的运用和调整问题，它们出现在正常的话语表达中，很多都是不自觉的行为。不过只要这种运用和调整出现在具体的语言活动中，各种修辞形式就会参与话语的建构，这样，它们就不仅具有纯粹的审美意义，也会具有特定的实践意义或认知意义。

修辞参与话语建构的最重要方面就是语言的转义使用：积极地利用各种修辞手段，从语言的形象性和说服力等方面入手，增强话语的表达效果。修辞的转义过程，可能是运用比喻、拟人等辞格加强语言的可感受性，也可能是通过对语言规范用法或日常用法的突破，以一种新颖独特的语言用法，引导人们更多地关注语言的形式。在这样的话语修辞过程中，语言表达不仅给人们带来审美体验，也影响了人们的情感和理智，修辞的说服作用通过审美的方式发挥出来了。从转义的角度来看，话语修辞不仅是对现实的偏离和重构，更重要的是对话语本身的革新，对话语修辞的审美研究主要不是以现实为参考，也不预设一个固定不变的本义系统，而是以经过修辞变形和包装的话语为对象，考察话语更替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审美特性。因此，审美层面的修辞学研究应当以对积极修辞的研究为主，即主要研究那种超越了所谓正常表达或零度修辞之上的具有感性形象之美的表达；而在积极修辞中又着重于话语在差异性中的运动，将修辞看做是话语运动的过程或话语行为。

转义在最初是指语言中有别于正常表达的辞格，人们通过改变词语的原有意义，临时赋予它们新的含义而形成转义。这样使用语言，有助于人们进一步感受和认识事物，却只能是从特定的角度突出了事物的某些特征。转义因而成为一把双刃剑，既表现和揭示了事物，又隐藏和遮蔽了事物。现代修辞学倾向于认为，揭示和遮蔽在修辞中是不矛盾的，语言的转义用法是

话语修辞的主要方面甚至根本方面，修辞就是为某一种言说方式所进行的精心设计，人们接受了一种修辞，就同时接受了其中观察事物的特定角度。这也构成了人类话语活动的根本特征，即任何话语都是修辞性的，都经历了揭示和遮蔽的转义过程。对修辞学而言，转义首先是指一种偏离了语言字面意义的、约定俗成的或“规范”的用法，背离了习俗和逻辑所认可的表达方式。转义通过变体从所期待的“规范”表达出发，通过它们在话语之间、概念之间确立的联想而生成比喻或思想。转义是话语的灵魂，也是修辞的灵魂。进一步说，人们是通过转义的方式来认识世界和传达意见的，这不仅是由于世界的流动性所致，也是由于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引起的，人在对世界的感性把握中，据为己有的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事物某些方面的特征。这种流动性和多变性为话语的更替提供了动力，人们在使用语言时不停地抛弃陈旧的表达方式，在语言形式上不断地有所超越或创新，一种美学动力始终伴随着转义行为的全过程。此外，任何一种观念的表达都会成为修辞性的，因为它是选择性的表达，这种在具体语境中对话语的取舍为转义的发生提供了可能。

修辞的正常表达和转义表达在话语中是相对的，二者之间是相互依赖和相互转化的，转义表达需要正常表达作为参照，才有可能产生意义的变化和转换，转义表达在被普遍认同以后就很可能成为正常表达。正常表达往往与规范、秩序乃至意识形态相联系，语言形式的光彩已经固化为僵硬的认知，只有在转义表达中，语言自身的魅力才得以呈现，人们才能在词与物的断裂中重返感性的世界。

### 三

在经历了长期的压抑之后，修辞学突然成为一种革命性的



力量，在 20 世纪的文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领域中大显身手。它通过在话语中的建构和解构作用，以一种审美的冲动不断打破、翻新主观性的“真理”——这正得益于转义修辞观念的确立。尼采的思想和由索绪尔开始的现代语言学转向共同促进了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转义修辞观念于是大行其道，从审美和认知两个层面促进了当代文化的现代性转变。所以，本书在词条的选取上以转义为中心，以审美和认知为两翼，突出 20 世纪西方修辞学的现代性。在写作上，立足于西方修辞观念的现状，力求把握概念本身发展演化的实际以及概念的深刻内涵。

本书试图从以下五个方面描绘 20 世纪西方修辞观念的地图：

第一，修辞与转义。辞格和转义是传统修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在形而上学的框架中已经被理性化，修辞要展示其审美的光彩，必须对此进行超越。在 20 世纪修辞观念中，转义不再被视为对本义的偏离，而是认为意义只能以转义的方式形成、传播和接受，修辞学的秩序因而被重建，以隐喻为中心的辞格系统转向以换喻为中心，摆脱了相似性而强调差异性和生成性。

第二，修辞与文本。文本是修辞得以彰显的处所，是话语修辞进行编织的结果，20 世纪西方文论对文本的重视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修辞的重视，这一部分集中分析文本理论中的修辞美学相关的关键词。

第三，修辞与形式。探讨 20 世纪形式美学领域中几个核心概念，分析修辞在形式建构及其审美意蕴生成方面的意义。

第四，修辞与认知。这一部分强调真理和意识形态的修辞性，修辞参与到“大写”概念的建构中，以假乱真，或者说 20 世纪修辞观念揭示的是，一切都是修辞，一切真理都是虚构。

第五，修辞与语言。20 世纪修辞学的复兴得益于语言学转

向，这一部分回顾、总结这一盛况。

谭善明负责关键词的选定以及写作过程中的协调工作，谭善明和杨向荣共同负责书稿的审订和校对。本书是集体智慧的成果，参与撰写人员基本上是在高校教学、科研一线的年轻博士，他们是（具体分工已在每一关键词后注明）：

聊城大学：高倩、单永军、谭德生、谭善明、殷学明、蔚凤燕

闽江学院：肖翠云

南京大学：李健

湘潭大学：傅海勤、王娅卓、杨向荣

云南大学：付立峰

中国矿业大学：史修永、周李帅

最后，感谢齐鲁书社刘海军先生，感谢聊城大学科研处和社科处，本书的出版是与他们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

谭善明

2011年9月



# 目 录

前言 .....	001
第一章 修辞与转义 .....	001
一、转义 .....	001
二、象征 .....	006
三、隐喻 .....	019
四、强喻 .....	028
五、寓言 .....	042
六、反讽 .....	051
七、相似性 .....	075
八、差异 .....	082
第二章 修辞与文本 .....	092
一、文本 .....	092
二、叙事修辞 .....	107
三、能指漂移 .....	122
四、隐含的读者 .....	137
五、作者之死 .....	143
六、零度写作 .....	149
七、文学接受 .....	161

八、对话 .....	167
九、理解 .....	175
十、复调 .....	189
十一、误读 .....	198
十二、解构 .....	208
<b>第三章 修辞与形式 .....</b>	<b>221</b>
一、形式 .....	221
二、符号 .....	238
三、张力 .....	250
四、材料与程序 .....	259
五、结构 .....	270
六、朦胧 .....	277
七、陌生化 .....	285
<b>第四章 修辞与认知 .....</b>	<b>298</b>
一、修辞认知 .....	298
二、真理 .....	305
三、意识形态 .....	312
四、主体 .....	323
五、历史 .....	330
六、显现 .....	340
七、身体修辞 .....	346
<b>第五章 修辞与语言 .....</b>	<b>355</b>
一、语言学转向 .....	355
二、语言的牢笼 .....	367
三、表征危机 .....	380
四、话语 .....	389



## 第一章 修辞与转义

### 一、转义

转义 (tropic) 一词派生于 tropikos。tropos, 在古希腊文中意思是“转动”, 在古希腊通用语中的意思是“方法”或“方式”。它通过 tropus 进入现代印欧语系。在古拉丁语中, tropus 意思是“隐喻”或“比喻”, 在晚期拉丁语中, 尤其是在用于音乐理论时, 意思是“调子”或“拍子”。所有这些意思后来都沉积在早期英语的 trope (转义) 一词中。<sup>①</sup>

#### 1

转义在最初就是指语言中有别于正常表达的辞格, 人们通过改变词语的原有意义, 临时赋予它们新的含义而形成转义。维柯指出, 在人类最初的语言中, 修辞主要通过以下四种转义方式参与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 隐喻、提喻、换喻和反讽。<sup>②</sup>

---

<sup>①</sup> 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 陈永国、张万娟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2 页。

<sup>②</sup> 参阅维柯:《新科学》, 朱光潜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第 180~183 页。



隐喻是最常用的方式，它往往涉及把无生命的事物赋予人的某些特性。比如，用“首”来表达顶或开始，用“尾”来表示末端或结束，用“嘴”或“腰”表示山的部位，果实有“肉”，岩石有“脉”，天空能“微笑”，波浪会“呜咽”，等等。而用“头”来指“人”，用“尖”来指“刀”则是提喻用法，即用事物的部分来表示整体。换喻是指用行动主体代替行动，用原因代替结果，比如“丑恶的贫穷”，贫穷本身无所谓丑美之分，而是其结果被认为是丑恶的，所以就反过来用结果以修饰原因，另外的例子如“凄惨的老年”、“苍白的死亡”等。最后，反讽是人在进行反思的时候出现的，即通过反思造成貌似真理的道理，比如“狐假虎威”、“守株待兔”这样的寓言。

这样使用语言有助于人们进一步感受和认识事物，却也只能是从特定的角度突出了事物的某些特征。转义因而就成为一把双刃剑，既表现和揭示了事物，又隐藏和遮蔽了事物。现代修辞学倾向于认为，揭示和遮蔽在修辞中是不矛盾的，语言的转义用法是话语修辞的主要方面甚至根本方面，修辞就是为某一种言说方式所进行的精心设计，人们接受了一种修辞，就同时接受了其中观察事物的特定角度。这也构成了人类话语活动的根本特征，即任何话语都是修辞性的，都经历了揭示和遮蔽的转义过程。对修辞学而言，转义首先是指一种偏离了语言字面意义的、约定俗成的或“规范”的用法，背离了习俗和逻辑所认可的表达方式。转义通过变体从所期待的“规范”表达出发，通过它们在话语之间、概念之间确立的联想而生成比喻或思想。转义是话语的灵魂，也是修辞的灵魂。进一步说，人们是通过转义的方式来认识世界和传达意见的，这不仅是由于世界的流动性所致，也是由于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引起的，人在